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3.04.016

五四时期湖南进步报刊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李慧君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 五四时期湖南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兴办报刊, 将其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 爱国和革命成为当时湖南报刊宣传的主题。湖南进步报刊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要大众媒介, 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进步报刊主要有《湘江评论》《新湖南》和《湖南通俗报》。湖南进步报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积极传播新思想, 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和进步书社联结成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使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为后期革命运动和湖南早期党团组织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关键词: 五四时期; 湖南进步报刊; 马克思主义; 早期传播

中图分类号: B27; G23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3)04-0115-08

引用格式: 李慧君. 五四时期湖南进步报刊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4): 115-122.

Hunan Pioneering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Early Marxism Dissemination During May Fourth Movement

LI Huijun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unan pioneering intellectuals actively ran patriotic and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o publicize Marxism. Th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were the major mass media in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process of Marxism, among which *Xiangjiang Review*, *New Hunan*, and *Hunan Popular Newspape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united with Marxist organizations and revolutionary bookstores as the publicity fronts, introduced Marxism in a systematic and critical way, and inspired people a lot at that time, leading to a satisfactory effect of early Marxism dissemination an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up-coming revolu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arly CPC and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rganizations.

Keywords: May Fourth Movement; Hunan pioneering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Marxism; early dissemination

收稿日期: 2023-04-1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研究(1902—1927)”
(XSP22YBC212)

作者简介: 李慧君(1978—), 女, 湖南益阳人, 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五四时期,进步报刊因为具有信息容量大、技术设备要求低和阅读不受时空限制等优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传播的主要大众媒介^[1]。这些进步报刊具有如下显著特点:内容上,旗帜鲜明地抨击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充满反帝反封建色彩;宣传形式上,把政治鼓动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充满批判、引导和组织的力量^{[2]15}。五四时期湖南的进步报刊为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契机,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一、进步报刊:湖南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要媒介

进步报刊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大众媒介。五四时期,湖南仁人志士此起彼伏地兴办报刊,将其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爱国和革命成为当时湖南新闻界宣传的主流导向^{[3]1}。毛泽东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2]81}。湖南新闻报业始于戊戌变法的《湘学报》和《湘报》。湖南先进知识分子把报纸看成有别于帝王谱牒的“民史”;有了报纸,中国人民就不再是“喑哑之民”;有了报纸,中国就有希望成为“极聪强极文明之国”^{[3]1}。由此,湖南涌现了一批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出现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热潮。1911年以来,湖南民族资产阶级和有识之士创办了《实业杂志》《实业丛报》《交通丛报》《矿业杂志》《湖南教育杂志》《教育粹编》等期刊,介绍新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提倡振兴实业,推行新式教育^{[4]89}。五四运动以来湖南革命运动高涨,湖南期刊报社走在前列,兴办了《救国周刊》《湘江评论》《学联周报》《新湖南》《湖南通俗报》《女界钟》《岳麓周刊》《湘潮》等。这些报刊记载了许多记述湖南省各地劳动、教育、实业状况的调查资料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通信,介绍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四运动后,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开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进步报刊抓住现实革命工作中出现的迫切问题,批判错误思想倾向,阐明正确道路,唤起人民觉悟,指导人民进行革命。这些报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宣传实践紧密结合在一

起,是列宁办报思想的中国化^{[2]79}。1919年湖南学联出版的《救国周刊》,1919年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校刊《岳麓周刊》,都提倡民主主义,弘扬平民精神^{[5]135};1919年明德学校校刊《明德周刊》提倡支持国货,唤起爱国精神;周南女校出版的《女界钟》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唤起女界同胞之觉悟^{[5]136}。为了传播新思潮,湖南各大中小学纷纷编辑期刊特别是编辑周刊,以致当时有文章将湖南长沙形容为“周刊的世界”^{[6]61}。毛泽东任主编的《湘江评论》是五四时期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刊物,在湖南和全国革命史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92},它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无情揭露和猛烈抨击,歌颂俄国十月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比较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其创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湖南》是五四时期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其主要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赢得了当时社会各界的赞誉。据不完全统计,学界所办期刊多达70~80种,占这一时期期刊总数的40%^{[4]92}。这些期刊充满爱国激情,宣传抵制日货,鼓动驱逐张敬尧、讨伐吴佩孚、驱逐赵恒惕,报道教育改革、妇女解放等本省本县实际事例,将爱国主义、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结合起来。湖南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初创立了一批进步报刊,各类马克思主义组织成立后又推动了新报刊和进步书社的形成,联结成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二、三本代表性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作为者

《湘江评论》《新湖南》和《湖南通俗报》是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进步报刊,其开展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

(一)《湘江评论》

五四运动前后,湖南先进知识分子一边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边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湖南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湘江评论》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报刊平台。

1. 湖南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有影响力的刊物

《湘江评论》是五四时期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力的刊物。《湘江评论》由毛泽东同志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办,共出版5期,还有“临时增刊”第一号八开一张^{[7]144}。毛泽东受

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委托筹备、主办《湘江评论》，在刊物筹备、出刊、发行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自始至终起着中坚和主导作用，他对《湘江评论》倾注了全部心血。《湘江评论》的内容定位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列强；出版发行主要立足湖南，同时面向全国大中城市，刊物也因此成为了湖南与外界联系的纽带。《湘江评论》栏目设置既有刊物本身的特点，又有湖南的地方特色，重点突出“评”和“论”两个字。

《湘江评论》模仿当时的《每周评论》，设立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等多个栏目，报道国内最新思想和革命形势，并及时讨论读者提出的时事问题。《湘江评论》刊发文章采用白话文，语言通俗易懂、活泼生动，深受读者喜爱。《湘江评论》第一号第1次印2000份，当天售光，后又加印2000份，不到三天又卖光。从第二号起印刷至5000份，仍然不能满足省内外读者的需要^{[8]399-400}。《湘江评论》极大推动了湖南革命运动的发展，并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传播新思想、唤起民众之觉醒是《湘江评论》办刊的宗旨。《湘江评论》出刊后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分量、刊文见解最深刻的报刊，其不仅具有湖湘文化的独特力量，也影响着世界。毛泽东撰写的《创刊宣言》，西方大事述评栏目的《各国的罢工风潮》，东方大事述评栏目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强叫化》《实行封锁》，世界杂评栏目的《各国没有明伦堂》《什么是民国所宜？》《大略不是人》《难道走路是男子专有的》《女子革命军》等25篇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使《湘江评论》呈现出崭新的战斗姿态^[9]。《湘江评论》以其革命的内容、强烈的批判精神、通俗的形式和新颖的文风博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称赞。《湘江评论》是思想性、战斗性很强的优秀革命刊物，湖南人民认为《湘江评论》是他们自己的喉舌，是“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北京《晨报》赞扬《湘江评论》“著论选材，皆极精粹，内容完整，魄力非常充足”^{[2]22}。《每周评论》《时事新报》《星期日》和《湖南》月刊都曾介绍《湘江评论》或转载其刊发的文章。《湘江评论》对当时的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全国性影响。毛泽东提到这一情况时说，“我是《湘

江评论》的主笔，这是由湖南学生办的报刊，对于华南学生运动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8]63-64}《湘江评论》积极提倡反帝、反封建理念，宣传科学与民主，歌颂俄国十月革命，鼓舞民众革命斗志，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2. 湖南思想界一面反帝反封建的鲜艳红旗

《湘江评论》是湖南思想界一面反帝反封建的鲜艳红旗，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湘江评论》提升了湖南民众的革命热情，增强了民众的政治觉悟，推进了湖南五四运动的发展。湖南的青年们在《湘江评论》的启引下，积极推动新文化与新思潮的传播，成为推动新文化、新思潮的急先锋^{[6]96}。《湘江评论》开辟了湖南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领域，它提倡新思想与新文化，鼓励民众与旧势力和旧习惯做斗争。《湘江评论》号召人民解放思想，打破封建迷信，打倒强权政治，改变民众命运，扫除长期以来束缚人们头脑的旧思想和旧习惯。毛泽东在评论中鼓舞人们冲破黑暗、寻找光明，以“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的精神去探索真理^{[7]147}。他要人们不要崇拜偶像，不要害怕强权，不要受传统迷信的约束。《湘江评论》每篇文章都宣传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洋溢着不妥协的反抗精神，给人以力量。“《湘江评论》是湘江的怒吼，代表着湖南人民的声音。”《湘江评论》广泛介绍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对帝国主义侵略进行猛烈抨击^{[10]30}，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湘江评论》所宣传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中已经可以看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和依靠工农劳苦群众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10]30}。《湘江评论》宣传阶级斗争、反帝爱国等思想最为彻底。《湘江评论》是当时长沙出版的各种刊物中思想性最高、战斗力最强的一种，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开辟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新纪元^[11]。

《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以彻底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斗争勇气传播马克思主义。《湘江评论》大力倡导民主科学，主张废除强权与迷信。《湘江评论》从创刊号到第四号，毛泽东共撰写了41篇文章，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工农劳动人民大联合的胜利^{[3]90}，鼓舞群众树立起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提出反帝反封建要“六

不怕”，反对反动政府的统治，鼓励群众要学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号召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实现“民众大联合”，指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湘江评论》热情歌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湖南人民了解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及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湘江评论》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无情揭露和猛烈抨击，开辟“俄罗斯研究”栏目，歌颂俄国十月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湘江评论》对湖南革命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创建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湘江评论》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像钢刀刺中敌人要害，对一切统治者与反革命派在思想上宣判了死刑。毛泽东指出，“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起而仿效。”他认为，只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才使“全世界为之震动”。十月革命“怒潮西向，转而东行”，在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湘江评论》积极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深刻论述人民革命的战略观点。为了提高群众觉悟，扩大革命影响，《湘江评论》积极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指挥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湘江评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启发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湘江评论》引导广大群众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提高民众觉悟，增加他们向反动派斗争的勇气，对湖南省和全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起到了推动作用，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对后来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湘江评论》刊发了大量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论，以及对国内国际大事的评述文章。这些文章观点准确，分析透彻，受到大众普遍欢迎。在《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一文中，作者指出，德国今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和俄、奥、捷联合成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如果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7]145}。战争结果必然是东欧诸国共产主义的成功。作者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世界形势与中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通过创办《湘江评论》，毛泽东开始了其“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活动，他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密切结合起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8]400}。

(二)《新湖南》

《新湖南》是继《湘江评论》之后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其积极介绍社会主义学说、世界劳工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赢得了当时社会各界的赞誉。

1. 继承《湘江评论》战斗精神的革新者

《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毛泽东接手主编《新湖南》，《新湖南》继续坚持以报刊为讲坛，积极宣传革命斗争思想，介绍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弊端，鼓励民众团结起来同封建军阀与黑暗力量勇敢斗争。《新湖南》周刊的前身是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救国报》，其由湖南省政府和雅里会（美国）所办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出版，后改称为“新湖南”。当时《湘江评论》第五期在付印过程中被张敬尧查封，毛泽东一时没有了发表文章的舆论阵地，龙伯坚、张维、李振翩等人邀请毛泽东担任《新湖南》的总编辑。《新湖南》周刊共出九期，从第七期开始进行革新，并发布革新宣言，称《新湖南》第七期以后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6]33}。《新湖南》自第七期开始，始终坚持上述宗旨，“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第七期刊载《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对此进行了深入诠释。

《新湖南》以马克思主义宣传为基础，自第七期开始真正实践了革新宣言宣布的四大宗旨，刊物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显著加强^{[6]33}。毛泽东每期都为《新湖南》撰写多篇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刊物采用通俗易懂而活泼生动的新文风，鼓舞民众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新湖南》刊期不多，却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好评，其影响波及全国甚至远及海外。1919年11月8日北京《晨报》刊登《湖省教育底一忧一喜》，“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也发行一种《新湖南》的周刊，实在很有价值……这真是湖南教育上的曙光了。”^{[6]34}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一期，对《新湖南》等进步期刊进行介绍，特别提到革新后的《新湖南》周刊，“其中精彩真是不少”^{[2]27}。1920年1月24日旅欧华人团体创办的《旅欧周刊》也对《新湖南》进行了介绍：“湘雅学校发行之《新湖南》，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底化身。”^{[6]64}

2. 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

《新湖南》以针砭时弊和救国救民为主要内容，紧密联系现实政治，立足现实问题，刊发大量马克思主义论述。《新湖南》是继《湘江评论》之后的又一革命思想传播阵地，它继承了《湘江评论》的战斗精神，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其影响波及全国，甚至远及海外^{[6]64}。改革后的《新湖南》革命性大大增强，每期都刊发毛泽东执笔的政论文，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湖南的传播和科学制定党的民主革命政策起到了促进作用。毛泽东在投身五四时期中国革命运动时已经走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新湖南》则标志着他从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问题和世界趋势，体现出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

《新湖南》把宣传救国救民作为核心内容，积极推行社会改革，宣传马克思主义。刊物继承了科学和民主的精神，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述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宣传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宣传联合战斗的重要意义，宣传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途径。这些宣传活动在工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湖南祝词》中提出：新湖南以新中国，新中国以新世界。涓滴之积，可成江河；尘埃之积，可成泰山。人各此心，心各此志，何患百利之不兴，何患百废之不举。

《新湖南》在其发刊词中提出了刊物的办刊主张：一是反对旧的礼教，提倡新的道德，使国人知所取从；二是改造家族制；三是提倡男女平权，生活独立；四是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分利坐食；五是提倡平民教育；六是灌输卫生知识。《新湖南》提出改革社会的主张，即新湖南新中国的理想^[12]。

《新湖南》继承了《湘江评论》的战斗传统，对军阀张敬尧督湘期间的虐政进行抨击，刊载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评新中国杂志》《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文章。其论说精辟，一似《湘江评论》，故读者有称：“《湘江评论》复活了！”^{[13]256}。由于革新后的《新湖南》周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反动军阀的暴政进行了猛烈抨击，因而更为张敬尧所忌恨。出完第九期之后，其也跟《湘江评论》一样被查封了。张敬尧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湖南人民更广泛更剧

烈的反抗。

（三）《湖南通俗报》

1. 湖南革命通俗报纸的典范

《湖南通俗报》是湖南革命通俗报纸的典范，其积极宣传反对专制、争取人民民主的思想。《湖南通俗报》的前身是1912年都督府演说科主办的《演说报》，1914年改为《通俗教育报》，1920年改为《湖南通俗报》^[14]。该报纸原来没有明确提出办报的方针与目的，内容空洞，形式单调，发行份数少，阅读的人不多。1920年7月，毛泽东由北京回到长沙，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对《湖南通俗报》进行了改革，设立了“通俗图书馆”，为市民提供免费书报，设立通俗教育讲演所，并定期在所内举行通俗演讲，如“共和常识”“公共道德”“日本的社会状况”等^{[15]376}。他出席第一次《湖南通俗报》会议，将反对军阀统治的宣传上升到普遍的反对封建专制、争取人民民主的理论高度，发出了“打倒旧势力”“建设新湖南”的呼吁。同年9月，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何叔衡邀请谢觉哉任《湖南通俗报》主编^[16]，周世钊、熊瑾玎任编辑。毛泽东提出改革报纸的具体方法，指出“湖南通俗报是向一般民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报纸中的文字要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关键是要根据事实讲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湖南通俗报》改革后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内容和形式都发生很大变化，积极向民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湖南通俗报》用楷书铅印，旁注注音字母。栏目有讲演、世界新闻、国内新闻、本省新闻、新智识、小批评、社会调查、琐碎语、谚语、歌谣、新字课等^{[15]375-376}。社会调查一栏由湖南各县来稿，反映当时湖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情况。如熊瑾玎在专辟的“新字课”专栏里教授读者文字，用拼音符号标出字音，再用几句通俗的文字解释字义，并见微知著，向群众讲述生活道理。这种做法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湖南通俗报》的发行数量由原来每期只有500多份，一下子上升到2000多份。《湖南通俗报》第四版相当于副刊，有小说、选录、特载，约占大半版。下半版为行情和广告，以毛泽东主办的文化书社广告为主，如“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通俗教育讲演所前晚讲演情形、“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

和“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续)”等启事^{[15]377},从其中可以看出文化书社销售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相关情况。《湖南通俗报》先后刊登记述湖南各地劳动、教育、实业状况的调查资料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通信,介绍马克思主义,报道湖南工人“五一”纪念活动,在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提升民众政治觉悟的重要平台

《湖南通俗报》结合湖南省的乡土特点,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人民大众进行民主政治和科学文化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湖南通俗报》运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宣传马克思主义,语言形式新颖,如“中国如睡狮,睡狮莫长眠,改造全靠新青年”等,以此唤醒民众觉醒^{[15]377}。湖南有些中小学甚至把《湖南通俗报》当成学生的课外读物,工人、市民和农民也逐渐成为《湖南通俗报》的忠实读者。为了扩大《湖南通俗报》的影响,充分发挥其对群众的教育作用,报社主动上门赠送,派人到市民居住区张贴宣传广告。《湖南通俗报》在1920年9月至1921年6月成为湖南党组织的机关宣传报纸。这段时间,毛泽东、易礼容在湖南各地进行社会调查,发表其调查通讯,抨击那种顽固坚持封建旧礼教的做法。《湖南通俗报》的世界新闻栏目注重劳动问题、殖民地问题和苏俄情况的介绍。1921年2月3日,《湖南通俗报》世界新闻栏目报道了苏联政府提出的“将从前帝国时代,与中国缔结各约一律取消”,中国政府可收回领事裁判权及取消赔款的新闻^{[13]260}。报纸经常报道苏联和其他各国革命运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军阀官僚的罪恶,批评错误思想和社会陋习。谢觉哉在报纸上发表《到底谁是过激派》一文,指出,“今人称‘过激派’是指俄国劳农政府。我看‘过激派’并不过激,只是怕‘过激派’的太过激了一点”^{[3]55-56}。《湖南通俗报》还刊发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反对军阀的相关论述,这些文章提升了人民群众对革命和斗争的认识。

《湖南通俗报》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积极宣传民权思想,是提升民众觉悟的重要平台。《湖南通俗报》站在民主主义立场报道国内和本省新闻,关注内战消息、自治问题、人民生活和教育问题,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军阀官僚的罪

恶^{[3]56}。相关报道文字尖锐泼辣,内容广泛,形式活泼。如谢觉哉经常在“小批评”“随感录”专栏发表揭露批判社会丑恶的短文,文章虽短,却句句搔着痒处,打中要害,颇受读者欢迎。其《自治是我们的权力,也是我们的义务》一文,提出“我们实行自治只是从强盗手里夺回赃物,因为我们管自己的事,本来是自己的权力!”他在《公民资格》一文里主张打破赵恒惕的“省宪”对公民资格的种种限制:“不然,口里只管喊‘湖南三千万人’,其实能与闻政事的,不过百分之几,那就很犯不着!”^{[3]55}1921年4月,毛泽东、易礼容和陈书农到洞庭湖滨的岳阳、华容、南县、安乡、常德、湘阴作社会调查,考察农村社会、教育情况,撰写调查通讯,《洞庭湖通讯》刊载在《湖南通俗报》副刊《社会调查》上^[17]。谢觉哉称赞之,“多么优美的文章!是我从来所未见到过的。我总是把它刊发在报上的最显著位置。”同年5月,《湖南通俗报》刊发五一纪念专号,报道湖南工人、学生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以及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礼堂举办1000多人的游艺会、讲演会。这次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尝试。毛泽东也经常到报馆约集新民学会会员、参加编委会议,谈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为建党做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湖南通俗报》引导着人民政治热情的发展方向,推动着湖南革命事业的迅速发展。1921年,赵恒惕政府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关停了《湖南通俗报》,并撤销了何叔衡的职务,湖南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也因此转移。

三、针砭时弊宣传革命:五四时期湖南进步报刊传播活动的特点

五四时期湖南进步报刊立足于各行各业革命实践的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不同群体的境遇和要求相结合,有针对性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五四”前后,湖南《大公报》《实业杂志》《矿业杂志》等报刊经常揭露帝国主义侵湘事例和阴谋,激励群众奋起抵制^{[18]24}。湖南《大公报》介绍马克思主义说,“依其主张,惟生产器具,应归公有,田地、矿产、公司、银行、铁路以及各种原料品,皆在其内,其余物品之专供人消费者,则咸归私有”,此“乃一种照准科学方法立论之社会主义”。

但将资本收归公有，用和平方法“均不能实行，则最后之方法，亦惟有出诸革命，阶级之战争，终不能免。据马克思之意识观之，决非出于后者不可”^{[18]56}。湖南各地学校通过出版期刊和通俗读物团结和教育群众，涌现了一批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在这些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报刊中，有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和他一度接编的《新湖南》，还有雅礼学校出版的《救国周报》，甲种工业学校出版的《工学周刊》，楚怡学校出版的《体育周刊》，长郡中学出版的《长郡周刊》等，它们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浏阳旬刊》还转载《民众的大联合》，发表《马克思主义专述》等文^[19]。湖南学生联合会表现出坚强的战斗性^[20]，在毛泽东的倡议下，成立了湖南学生周报联合会，各报刊之间互相协商，商定好轮流出版的日期，以便让读者每天都有报读；联合会还代销全国各地的进步刊物。湖南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兴办的政治类报刊，强调借用报刊针砭时弊，指明革命道路，紧紧抓住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对人民群众进行生动具体的政治思想教育。同时注重对人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将劳动群众作为报刊宣传的主要对象，把反映群众生活、启发群众觉悟、提高群众斗争艺术作为报刊宣传的重要任务^{[21]40}。

这些早期报刊刊发的政论说理与论战融为一体，运用事实逻辑驳斥和回击敌人的进攻，具有鲜明强烈的战斗风格。由党组织或共产党人创办的报刊，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宣传革命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21]20}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大量的通俗刊物，出版小册子和传单，运用问答等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阐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中共湖南支部、中共湘区委向工人和平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指派李六如编写通俗读物《平民读本》1~4册，公开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5]75}，通过事例，形象、具体地揭示了工农遭受压迫剥削的原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原则，强调工人阶级的大团结是战胜资产阶级的武器。中国共

产党高度重视报刊书籍等出版宣传工作，并对出版内容做了系统规定。“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无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这些报刊向工农群众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向他们宣传团结战斗的意义和争取自身解放必须遵循的途径，其宣传在工农群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湖南早期传播者借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在报刊上阐述政治斗争的作用，明确提出利用报刊宣传反击敌人的具体办法^{[21]54}。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要求“自治省的湖南”要注意劳工的三件事情：一是劳工的生存权，二是劳工的劳动权，三是劳工的劳动全收权^[21]。1922年全国劳动大会以后，为了配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劳动立法运动，李达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劳动立法运动》。他首先揭露了所谓中华民国“约法”的实质，指出中华民国的种种条例刑律是“限制人民自由的工具”，然后又说明作为劳动者解放“第一步”的劳动立法的必要性。他指出，凡是劳动者，都应急起直追，切不可观望不前^[22]。打破旧的法律，推倒旧的政府，就需要劳动立法，劳动立法决不是特权阶级的“恩赐”，而是需要全国劳动界通力合作去争取的。

湖南进步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传播，使早期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进步报刊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早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阐释，尤其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前途、手段等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展开了初步探索，并逐步形成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知，这为推进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实践证明，进步报刊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后期革命运动和湖南早期党团组织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充分准备。

参考文献：

- [1] 李军林.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 [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3：48-49.
- [2] 窦其文. 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 [M]. 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

- [3]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 第二十卷·新闻出版志·报业[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3.
- [4]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 第二十卷·新闻出版志·出版[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1.
- [5] 湖南革命史词典编辑委员会. 湖南革命史词典[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一辑[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第一集(上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 1959.
- [8] 郝安. 从《湘江评论》到《新湘评论》[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室. 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史论的研究历程: 中国学界文选: 第一卷(1980—1989)[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83.
- [10]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中国共产党史稿: 第一分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11] 中国革命博物馆, 湖南省博物馆. 新民学会资料[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595.
- [12] 湖南学生联合会, 新湖南社, 湖南自修大学. 湘江评论 新湖南 新时代[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前言 6.
- [13] 叶再生.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 第二卷[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2.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1920)[M]. 3版.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506.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第二集(上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 [16]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百年志(1900—1999)[M]. 长沙: 长沙市桥头印刷厂, 2000: 33.
- [17]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大事记(1919.5—2012.11)[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8.
- [18] 宋斐夫. 湖南通史: 现代卷[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 [19] 倪兴祥.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389.
- [20] 李慧君.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与传播[J]. 湖湘论坛, 2022, 35(6): 20-28.
- [21]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7.
- [22] 李达. 李达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190.

责任编辑: 徐海燕